

明代版刻總錄

王
子
野



明代版刻錄

錄

王子野



序

· 周采泉 ·

杜君信孚供職于南京圖書館二十餘年，曾著有《同書異名通檢》及《同名異書通檢》，銷行國內外，今又以其所著《明代版刻綜錄》一書即將問世，問序於余。是書共收明刻近萬種，朱明二百七十餘年所有刊本存世者，包括官刻、坊刻、家刻，均按刻書家著錄。每一書名下除錄卷帙、時地，並有監修、校刻人之小傳，兼及行格、牌記，以及版刻之特點。不必附「書影」，而讀者宛同披卷，真實用之書也。

明代刻書之風甚盛，其優缺點前人言之詳矣。但終嫌缺乏目驗比較，耳食之談，未足爲據。今滙爲一編，於是可以覘一時學術之風氣，刻書之風格，以及社會傾向，經濟動態，是皆前人究版刻所未措意者。明刻大致可分三大階段：自洪武至弘治所有版刻，渾穆淳樸，字體凝重，版心寬大，幾可媲美北宋；正德、嘉靖兩朝，刻書最多，書品精美，字大宜老，亦不亞于南宋之乾道、淳熙；萬曆以後，國步陵遲，刻工紙張，遠遜于前。但如吳興閔氏套印及其他版畫，雕印之精工，誠是空前絕後。其時「叢書」勃興，往往以牟利爲目的，改易書

名，任意割裂，所謂「明人刻書而書亡」，殆指若輩而言。此則治版本者，亦應「好而知其惡」，不必爲明刻諱。迨崇禎朝虞山毛氏汲古閣，以其藏書之富，並延請名流校勘，鳩集良工，從事雕鏤，儼然爲出版商之先河；殆與南宋建安蔡夢弼、余志安分庭抗禮，此又一時也。毛氏之書雖多半刻於易代而後，竭力保持先人矩矱，以此爲明刻一代結局，正不必以鳳苞隸明，季斧屬清，強作斷代矣。

明刻嬗變之歷史大致如上，至于「牌記」及刻工姓名，均仿自趙宋，明刻或有或無，並不一律。牌記等于後世之商標及版權印記，本無關宏旨，但對研究版本，或以圖案勝，或以文字勝，頗有研究價值；宋刊刻工姓名，賞鑒家錄入手冊，作爲鑒定版刻之依據，其價值遠勝于牌記。惜萬曆以後坊刻，非出于良工之手，類不標出姓名，此又明刻異同所在。若版心之「黑口」、「白口」，隨時代風格而異，爲書品之特徵，本書亦注意及之。又明代刻書，書末往往附有全書所刻字數、雕刻工資，甚至當日米價，亦有記載。爲研究經濟史者提供珍貴資料，此尤明刻所特有者。

《綜錄》之作，足以補《明史·藝文志》之未備，可以作「書史」讀，亦可以補《藏書

紀事詩》之類書林掌故之缺，又可以增益各種版刻圖錄及各家書影所未收，其爲用亦大矣。

余治杜詩，著有《杜集書錄》，于若干種明刻之杜詩，若孫文龍等數家，皆不知刊者之里籍時地，持以叩君，君舉以相告，裁答無滯，蓋其寢饋于斯匪一日，故于明代刻書人歷歷如數家珍也。

昔張之洞常勸人刻叢書，謂校刻書人之姓名，可以經五百年不朽，吾則以爲治圖書館工作者，莫如多編工具書，科學分類，秩然不紊，綱舉目張，使用者一索即得，即爲有用之書。我爲其難，而予人以方便，我任其繁，而示人以捷徑。工具書之效用如此而已，豈斤斤爲一己之名利計耶？此編爲七十餘萬言之巨著，爲究明刻者必不可少之書，不脛而走，固可斷言也。故樂而爲之序。

• 《同書異名通檢》，一九六二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一九六三年復由香港太平書局影印發行。

自序

有明一代，由洪武以迄崇禎，凡二百七十六年。其間書刻，不僅保存了明代衆多之史料，而且由於明刻承前啓後，繼往開來，實爲我國出版史上之重要一頁，並爲歷代研究家所重視。

書籍之行世，自以學術湛深，內容豐富爲先決條件，然版刻之道亦不可不講。即如明蘄縣李時珍之《本草綱目》，搜羅宏富，抉擇精詳，固已造福人民，彪炳後世；蓋以良工書寫，妙手雕鏤，成書之後，使人讀之，有開卷一樂之感，則見版刻之可貴也。

版刻之道，首重書法。所有名刻，無不繕寫精工，字體悅目，不但具有美感，抑亦足資考證。蓋明代各地，書家輩出，蔚成風氣。從刻書之書法流派，可作分析某書刻於某地某時之一助。惟覆刻宋元刻本則不然，例如明金臺汪諒所刻《文選》，雖有刻書牌記云「明嘉靖元年刻」，實則舊版重印，此又研究版刻書法者所不可不知也。

其次，則鏤刻之精粗，全依削鏤之神。至于杉枳棕虜，考工之所不載，膠清彩液，巧繪

之所難施，則印工亦未可忽也。最後裝潢一道，亦可見時代後先，地區南北，款式各異，形制或殊，不失爲推斷版本之依據。

明代版刻，大體分之三類。曰：官刻、家刻與坊刻。官刻者多爲當時統治階級服務，家刻則多爲宣揚私人著作或傳播特殊愛好而刻，坊刻雖射利所爲，然亦人民群眾之所需要，足覘一時之風俗習尚。凡此種種，無不反映當時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之系統情況，提供哲學、藝術、社會、科學之參考資料。綜錄成帙，朗若眉目，實稽古之一助也。

然而搜輯一代版刻，列爲綜錄，首須注意版本之鑒定。前人於此，每多訛舛，雖版本專家，亦不免千慮一失。即以清代四大藏書家而論，其善本書目中，誤謬之處，亦屢見不鮮。

例如清丁丙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、《益山書影》，其中將《四書輯釋通義大成》定爲元刻本；余見《中庸》序後有剗改痕迹，經反復研究，定爲明正德庚申年熊氏進德堂刊本。嗣後覓得同書比對，爭議始息，甚矣版本鑒定之難也。又如《靳兩城先生集》二十卷，明靳學顏撰。前序文曰：「竹陽王公從其子需、雷、雯攜拾遺逸，得若干首委之剗闕。」查《濟寧州志》，王湘字太清，號竹陽，其先平度人，徙濟寧。因此定爲王湘刊本。再如《梅巖胡先生文

集》十卷，宋胡次焱撰，明嘉靖十八年胡璉刊；又有嘉靖二十二年胡陞刊本。前人往往定爲一個版本，其實不然。胡璉本之排列：一賦，二樂章，詩，三序，四記，五論，議，六說，銘，七跋，八啓，扎，九附錄，詩，跋，啓，告文，十書。書名在魚尾上方，胡陞本之順序：一序，二記，三論，四說，銘，五賦，六樂章，詩，七跋，八書啓，扎，九附錄，詩，跋，傳，啓，書，十書。書名在魚尾下方。兩者判然有別。

其次，明代家刻本中，往往有各方面之資料散見於群書。如無錫顧起經刻《類箋唐王右丞詩集》十卷、《文集》四卷、《外編》一卷、《年譜》一卷、《唐諸家同詠集》一卷、《贈題集》一卷、《歷朝諸家評王右丞詩畫抄》一卷，其中詩集卷一刻於沐園，卷二刻於長康外圃，卷三刻於宛在亭，卷四刻於祇洹館，卷五刻於對山開卷之閣，卷七刻於水木清華亭，卷八刻於木瓜亭，卷十刻於靜思之堂，文集卷一刻於圓鍛亭，卷二刻於青藜閣，卷三刻於思玄室（其餘未注）。由此可考證顧氏園林之衆，亦研究刻書與私人園林者之所當借鏡也。

復次，無論官刻、家刻或坊刻圖書，其刻工姓名及牌記，對考訂版本，亦極關重要。本綜錄對此特一一刻意蒐求之。

余服務圖書館垂三十年，鑒定版本時，偶有所得，隨手扎記，爰於公暇將有明一代版刻輯成一書。先列刊者名號小傳，次列書名、卷數、著者、年代、版本、行款、刻工、牌記（包括牌記在某書中之前後位置及牌記原文），積之多年，共約八千餘種。其中僅刊者傳記一項，即查閱地方志五千餘種。凡序文中稱字或別號者，一律標出本名。

建國三十年來，深感社會主義祖國科學文化事業蓬勃發展，學術研究百花齊放。爲學術界研究之便利，輯成《綜錄》，務使讀者披閱之下，瞭如指掌。其所未聞，不敢妄書。本書之搜集資料及編排、謄錄諸工作，胥賴小兒永康任其勞，俾獲及時脫稿。自知謬誤難免，博雅君子，幸指正焉！

杜信孚序於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

【附】明代版刻淺談

· 杜信孚 ·

我國在六世紀末葉的隋代，已有雕版印刷的萌芽。到唐代，雕印的技術逐步發展到精美熟練的階段，當時刻印了廣大市民階層常用的通俗書籍和佛教經典。唐以後的五代，刻書事業得到進一步發展，這時正式刊印了經傳。到了宋代，雕版印刷進入了黃金時代，所刻的書，字體優美，紙質精良。歷代正史大書，到宋代才陸續付刊。唐和五代刻印的原本，流傳極少，幾如鳳毛麟角。就是宋元兩代所刻印的書，由于年代久遠，歷經兵燹，流傳到現在的也爲數稀少。而有明一代二百七十餘年，所刻的書極多，保存下來的明代刻印的原本，數量之大，品種之多，都遠遠超過前代。

印刷術在明代，尤其在明代後期，有了輝煌的發展。明代刻書，可分爲官刻、家刻和坊刻。官刻的機構，有南北國子監、欽天監、太醫院，還有司禮監附設的經廠；地方官刻有各省布政司、按察司、書院；很多府縣也都刊刻本地地方志及當地人物著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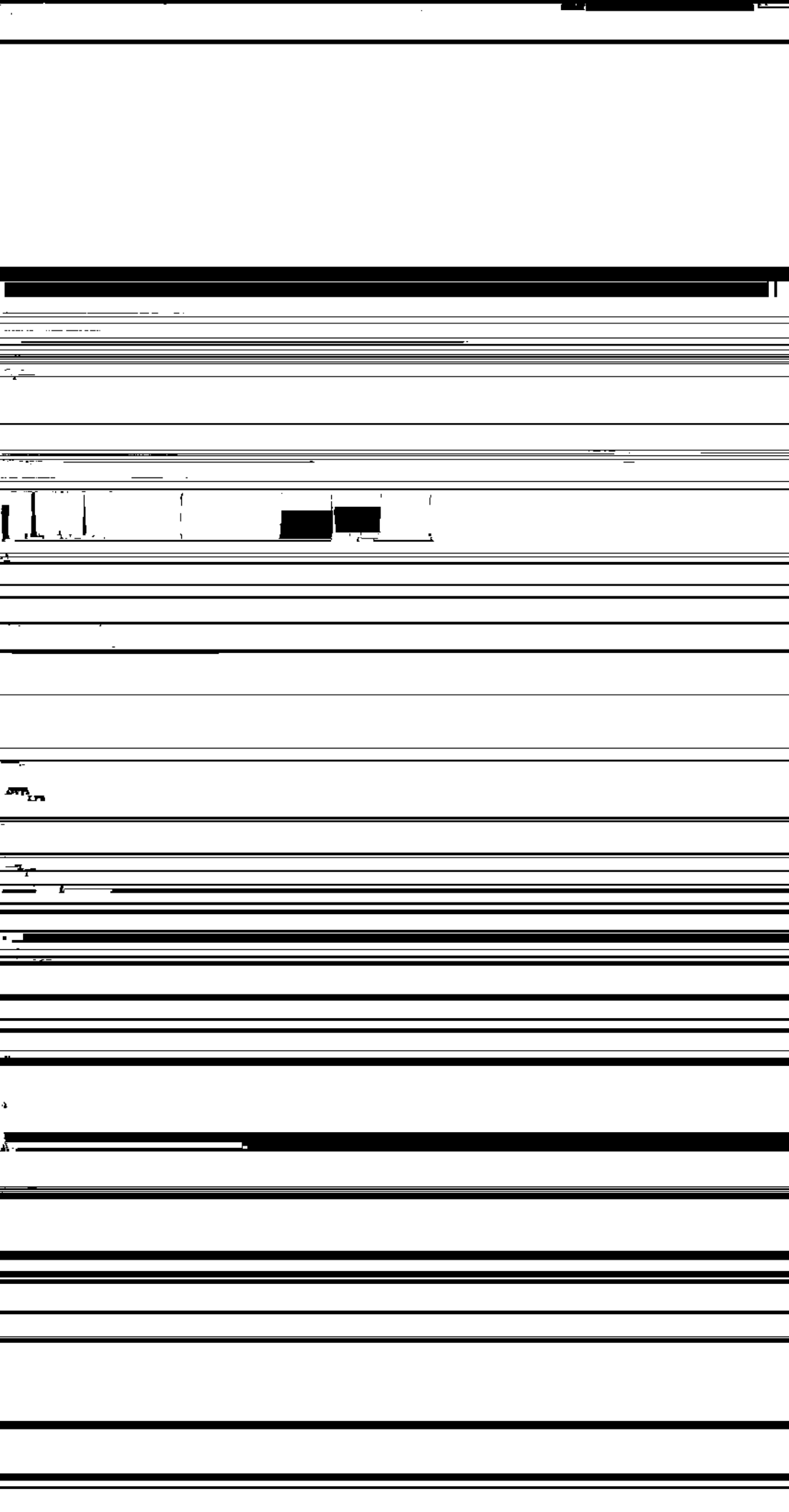
明代有分封制度，皇帝子孫分封各地爲王，其中有好些人刻了書。如秦藩、晉藩、周

藩、魯藩、遼藩、寧藩、鄭藩、徽藩等，所刻圖書，都以朝廷賞賜給他們的宋元舊槧爲底本，世稱「藩府本」。

明代除官刻本外，私人的家刻本也非常盛行。明初的家刻，承宋元風氣，沒有多大變化。嘉靖以後，翻刻舊本之風大盛。如吳縣袁褧，字尚之，號謝湖，他所刻的《六家文選注》可做爲這一時期代表。他在跋中說：「余家藏書百年，此本甚稱精善，因令工翻雕，匡廓字體，未少改易，計十六載而完。用費浩繁，梓人艱集。今模搨傳播海內，覽茲冊者，毋徒曰開卷快然也。」該書字體橫輕堅重，以後匠體字漸興，即後人所謂「宋體字」。明後期字體逐漸變爲四角嶄方的方塊字。

刻書區域多半集中在江浙兩省。他們除刊印古籍外，還翻刻宋元本，再如明王延喆，即摹刻宋黃善夫本《史記》、《本草單方》等傳世。

至于坊刻本，仍沿宋元遺風，以福建地區爲最盛。元季毀于兵燹，明弘治十二年建陽書坊復被火災，古今書版盡毀。明初閩坊本，反較昔日爲少，尚存有勤有堂、清江書堂、進德書堂、慎獨齋、歸仁齋等，都是明代前期的建陽名肆；忠正堂、誠德堂、三台館、雙峰堂、



尚有汪氏書鋪、葉氏書鋪，于弘治、嘉靖、萬曆間刻書頗多。

活字印刷術的發明，是印刷史上一次偉大的技術革命。世界上第一個發明活字印刷術的，是我國宋朝的畢昇。他在北宋慶曆年間（一〇四一—一〇四八）創造了膠泥活字，比歐洲最先用活字印《聖經》的德國人谷騰堡（一四〇〇—一四六八）要早四百年。我國元代的王禎在皇慶年間（一二二一—一二三二），又創造木活字，把活字印刷術又推進了一大步。可惜宋元的活字本，很早就失傳了。在王禎的《農書》里，尚保存着活字印刷的史料。

到了明代，隨着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，使用木活字的地方也比過去多了。不但流行在蘇州、杭州、南京、福州等沿海城市，而且發展到四川、云南等僻遠地區。

用銅活字印書，是明代印刷術的一個重要發展。弘治、正德、嘉靖年間，在江蘇的無錫、常州、南京一帶很盛行，其中最有名的是無錫華家和安家。華家有華燧，字文輝，制銅活字印書，名其所曰「會通館」，人稱「會通君」，事跡詳邵寶的《容春堂集》；他用銅活字印有《會通館印正錦綉萬花谷》等書。華燧的侄子華堅和華堅的兒子華鏡，也都繼承了華家銅活字印書事業。華堅印的書，有「蘭雪堂」牌記，用銅活字印有《元氏長慶集》等書。

和華家同樣有名是安家。安國用銅活字印書相當認真，錯漏很少，所以質量很高。他印有《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》一百零九卷，以《千字文》編次；在邊欄外，印有大字「宙七十二」、「洪七十三」等編號。除每卷印有卷數外，加上這樣的編號，次序更加清楚，好象西書中指示裝訂次序的記號，可以大大減少誤差，這在中國書中是不多見的。由此可見裝工的細致認真。商務印書館影印《四部叢刊》，將《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》欄外的編號挖去，甚可惜。

明代印刷術的另一大發展是套印的應用。套印在元代已經發明，可能僅有朱墨二色，而且未被廣泛應用。明萬曆年間閔齊伋、凌濛初等都用套印的方法，不加界行，刊刻帶有批注評點的書，一般稱爲「朱墨本」。後來發展爲朱、墨、黛、紫、黃五色。把套印術和版畫結合起來，就稱爲彩色套版，這是明代雕版技術的輝煌成就。明代歙縣程大約的「滋蘭堂」用彩色套印有《程氏墨苑》，今彩色印本極罕見，墨色印本則南北各館均有藏書。該書編者、刻者都是當時名手，刻工達到刀頭具眼，指節通靈，一絲半毫，全依削鐫之神。人物故事，山水宮室，細紋密縷，栩然如真。

明代的鈐板，是從彩色版畫發展成功的。彩色版畫產生後，因爲顏色邊界尚有浸染之

迹，便改爲分色版畫套印法，稱爲「餛板」。其法將彩色畫稿先行分開各種顏色，鈎摹下來，每色各刻一版，然後逐色依次套印，成爲五彩繽紛的木刻畫。這時還發明了用凸凹兩版嵌合，使紙面拱起的辦法，稱爲「拱花」，能使花紋凸出于紙面上。崇禎年間，胡正言利用了「餛版」、「拱花」兩種方法，編印了《十竹齋畫譜》、《十竹齋箋譜》，刻版套印，十分精緻。顏色新鮮，云紋水波，凸現紙上，流動如真，達到水印木刻上乘。胡正言，字曰從，原籍新安，寄寓上元，家在南京鷄籠山麓（即今北極閣下）。他在庭前種竹十餘竿，故名曰「十竹齋」，刻有圖書二十種左右。金陵吳發祥（傳見《金陵通傳》）刻的《蘿軒變古箋譜》二卷，白口，單欄，上冊四十九頁，九十八面，下冊四十五頁，九十面。書成于天啓丙寅，要比胡氏箋譜早十九年，該算是餛版刻印最早的傳本。現由上海書畫出版社複製出版，日本亦有影印本。

綜上所說，可見明代雕版印刷技術比前代更加進步，活字、套印，彩色餛版、拱花等，應有盡有，版式裝幀也有更新，出版事業比前更加普及，出版書籍的內容也更爲多種多樣。

清代史學家王鳴盛在《十七史商榷》中說：「凡讀書最切要者，目錄之學。目錄明，方可

讀書，不明，終是亂讀。」但如僅有一般的書名目錄，而不明版本，就不能求得善本，做研究工作，就不能得到可靠資料，甚至爲劣本所誤。如雖讀數本，而對各種版本搜羅不全，研究不細，也會發生差錯。明人最尚詩文，很多詩文集，大多是作者自刻，或後人、門人代刻。家刻本自序題本名，代序者稱號或稱某公或官職，也有用室名的。因此，鑑別版本，必須了解刻者生平，特別要弄清他生平中與刻書有關的情況，如本名、字號、學歷、官職、著作、室名等。鄭西諦在《劫中得書記》中說：「余所藏《北雅》乃張孟奇刻，初不知張孟奇爲何人，今見《彙雅》，乃知張孟奇即張萱。萱爲少數民族，尚存有清真館本《雲籍七籤》，即萱所刻。」還有「黛玉軒」也是張萱的室名。如果不了解刊者生平，往往會把一個人誤爲好幾個人，也就是把一種版本誤認爲多種版本。余曾在鎮江市圖書館見有《宋朝道學名臣言行錄》一書，書衣上有康有爲的親筆題跋，鑑定此書爲宋本，再看此書總目下第二行有「張鰲山校正重刊」字樣。查張鰲山字仁弼，安福縣人，正德進士，官浙江道御史。從刻者生平，顯而易見此書爲明刻本，而非宋刻本。余多年接觸目錄二千餘種，獨缺明代版本目錄，要查考版本原委，無法尋檢。前人鑑定版本，搜奇挾秘，各有所長，但往往不能用科

學方法系統地全面地進行研究，因此分歧百出，使人無所適從。黃虞稷的《千頃堂書目》，是一部著錄明人著作的總目，惜不著版本。其後有莫友芝的《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，雖注重版本，但搜羅不全，又不知何人曾刻何書，以及刻書起迄時間；又未注明收藏情況，對學術研究幫助大不。今人潘承弼、顧廷龍先生編的《明代版刻圖錄》，專攝書影，對研究版本很有幫助。但古籍浩如烟海，書影總是有限，圖錄未收入的書要確定版本，仍有困難。

編者涉獵未深，茲僅言其大略，聊盡拋磚引玉之忱。尚乞海內學者同行，進一步發掘研究，俾為社會主義之學術研究事業，提供更豐富更有價值的資料。